

高峰之路

——关于艺术创新的思与想

写在前面 怀有赤子之心、澎湃着艺术创作激情的周天黎，其精神家族中，有中华传统文化里的屈原、嵇康、司马迁、李白、杜甫、苏东坡、关汉卿、唐伯虎、李清照、陆游、徐渭、八大山人、石涛、曹雪芹、郑板桥、龚自珍、谭嗣同、梁启超、秋瑾、鲁迅、陈寅恪等先贤巨擘，以及对世界一流优秀先进文化艺术思想的掌握吸收。她的绘画，灵性敏锐，创新求变，色墨相融，独具一格，在中国绘画走到21世纪这个关节点之际开创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地；她写艺论，哲理之辩，荡思八荒，坐看星云，独钓银河，启迪和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对当代美术的发展进程产生着理论性影响。



□ 周天黎 文/图

时间承载万物，也湮灭万物，思想却能长存。许多年来，中国美术界的艺术批评和历史的深度梳理是相对贫弱的，一些学者、评论家们之间情绪化的流派嫉嫌、中西之辩，包括那种把先锋、名气、官职、金钱熬成一锅“八宝粥”的现象，都无法概括为弘远的思想之景。我一个中国画家责己与高期待值的立场看，虽然“建立中国美术标准、彰显中国美术气派”的口号很响亮，各种美术活动繁多热闹，可是中国美术界思想与价值紊乱的状况仍待克服，人文素质整体上有待提高，原创力和批判力同样匮乏，中国美术在世界格局中集体性失语也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扭转！我一直期待以有分量的艺术理论和思想观点面对当今的世界。再者，我坚持认为，社会不断演变，人类对自身价值的追求几乎是永恒的，没有止境；人类开拓新时代文化精神的过程，都是创造意志引导的历史突进。

中国画西化泥古均不可取 人类历史本质上是文化史

在中国绘画的创新与发展问题上，不分好歹，呼天抢地，“一路向西”，当然不足取；同样，水讷颞颥，捶胸顿足，因噎废食，不思变革，也不足以谋。我们与古人所处的时代背景、政治环境不一样，必然有着与古人不一样的感知、情怀和对社会生存的诉求。我们要化古而不泥古，师古而不复古。我们的思维和境界决不能囿于古人的思想而死板地重蹈前人的覆辙。我们要沿着前人的足迹走出一片新天地。这也是明确艺术姿态准确与否的基本要素。所以，我们对传统文化深知深觉的同时，既要避免妄自尊大，也要避免妄自菲薄，要继承和批判并举，除旧布新，发扬光大，使其融入新时代改革。如儒家思想，虽然看起来轨迹宛然，都包含着对儒家政治理想和伦理道德的终极追问，但是孔子的儒学、孟子的儒学、董仲舒的儒学、朱熹的儒学、王阳明的儒学、顾炎武的儒学，都有所不同，有很好的也有很坏的，也都有所发展。我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不应是新瓶装旧酒，而是要重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并且，无难度的思考必然导致平庸作品的泛滥，这也是近年全国美展不尽如人意和产生许多思想浅薄、简单复制、抄袭拷贝之喧嚣画展的根本原因。美术史的核心离不开人文与学术的支撑，真正的人文精神与学术精神从不离事而言理，“离器而言道，是犹离形而求影”。于此，对艺术的探索离不开认识论的探索，而不是简单的技

巧、形式、材料上的实验。从广义的艺术社会史角度看，需要艺术家和艺术思想家们的赤子之心，念兹在兹，胸有浩茫，神气清明，理清荒谬，瞻之在前，蹈厉锋发，矢志不渝，孤怀独往，尘埃潇潇，苦苦求索。

人类本质上是高于自然逻辑的文化存在。因而，人类历史本质上是文化史，也是自然史之上的意志史。一位哲人说过：“我是人，人类的一切对我都不是隔绝的。”他又说：“人类有相同的本性，也有相同的人生命题。”对人类的命运作纵横观，我们有理由关注，西方文明的近代崛起论证了一个清晰而明确的道理：人的创造意志是人类历史前进的莫大动力。艺术又何其不然！发生在14世纪-17世纪之间的“文艺复兴”运动中，不断涌现出来的创造意志孕育出了喷珠溅玉的创新意识，并因此丰盈和强化了西方文明的生命力。在这个信息量化的社会，日新月异的乐章奏响科技起飞的赞歌，欢呼着量子的来临；人工智能前景的预言，将颠覆很多常规；知识越来越丰富，让人类意识的规模与范畴日益扩展，人类世界既有的生存概念、艺术思想或多或少也都在发生微妙的演变。“西学东渐”“东学西渐”彼此交融。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文化和艺术，其实是一直互相交流、相互影响着。我们要展现出富有文化自信的大国气派和富有战略定力的领袖风范，精湛把握历史脉搏，超越历史坎陷，在追求民族文化独特性的同时，要以豁达的胸怀，学会欣赏不同的艺术美学品质，博观约取，为我之创造和强我之元所用。

中国画发展需要创造性思维与作品 会通古今融贯东西开创中国画新貌

严格意义上的绘画创作必定建立在深厚的学术根基上，没有深刻的思想认知与学术主张，难有独具特色的作品面貌。置身当代，展望未来，环顾整个中国画坛，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欠缺锐利的情感锋刃，不以创造性为目的而单纯地继承文化遗产，是艺术创作的一大歧路。艺术家的创作怎么能够在老祖宗早已铺设好的轨道上轻松地滑行呢？怎么只剩下图像的翻造与模仿呢？蹙眉之美只属于西施。因为，那种美是心灵的外化。东施效颦，不能不贻笑大方。因为，美不能靠抄袭来获得。然哉！一个卓越或伟大的艺术家，如果其作品仍然眷恋于传统观念、传统形式而无法创新，无法展现时代特性，无法表达对当代生存境遇的思考，没有“借笔墨写天地而陶咏于我”之昂扬清俊的情思，那么不管其操作的声势有多大、权力位置有多高，这个画家的卓越或伟大是值得怀疑的。需要指出的是，有不少画家在自觉与不自觉的旧有思维模式与市场商品化的双重牵制下，形成了一种以功利性与世俗经验为主的审美导向，进而形成一种套路化的创作模式，使艺术成为技术，堕入不断克隆与循环性重复的平庸。

我曾特地到欧洲最杰出画家之一德拉克洛瓦(1798年4月26日-1863年8月13日)的墓地凭吊，我之所以有此举，是因为德拉克洛瓦的艺术见解在我年轻时就深深地影响了我。他认为：“艺术家的目的，绝不在于精确地再现自然”，“冷冰冰的准确的描绘并不是艺术”，“好的作品总是艺术家的想象创造出来的”，“能够把艺术家的真正的想象表现出来的作品，才是最上乘的作品”。唐朝司空图说：“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艺术创作的意义或者说其成立的前

提，当然在于作品的创造性。没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不是艺术家，只是一名手工匠人。什么是创造？某种意义上说，创造就是敢于做少数，敢于被争议，敢于在认知的行进中打破沉重的文化枷锁！当然，这种“创造”应是自然的、本真的。虚情假意不可能使人感动，更不可能留传得下来。也就是说，绘画应该是画家生命状态的真实反映，且深具历史和现实关怀，这也是艺术创作的内在规律。所以，作茧自缚、陈陈相因不可能产生杰出的艺术——那不但是种负值向度把握，是狭隘的愚蠢、拙劣的短视，是艺术本质上的惰性，而且是一个死结！

人的意义，正在于他绝不会停滞在某种终止状态。历史总是在前行，有记载的人类文明从开始到今天在时间上也只是历史一瞬，作为艺术家的我们只有竭尽全力思考并前进，才有可能跟上历史的节拍。中国古代传统经典《易经》有一个十分深刻的总体含义，即什么东西都在变，只有变是不变的。就此逻辑而言，人类总会在每一个阶段性节点重新认知新的发展方向和新追求，为此，任何对人类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化形态，在历史演变发展进程中，客观上都会产生缺乏活力并只属于过去的某一部分，同时也都有属于现在和未来价值的主流脉络。文化像似一条河，有新的活水就会有新活力，才会长盛不衰。任何开拓新的时代精神的过程，都不可能是向过去的全面回归。中国绘画艺术生命活力的焕发和创新，如何推动？怎样进行？对此，基于“不同文明之间是可以进行相互补充”的辩证、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自己的美学实践，我多年来一直强调“会通古今，融贯东西”的观点。一是要以古为鉴，吸收历史文明中的智慧，借古更新；二是要以理性的态度面对世界，消除文化壁垒，打破精神隔阂，以外为镜，从中反观自身文化，进一步看清本民族文化的优势与问题。这两面镜子是我们复兴前进道路上都应看重和顾及的。特别是在文化艺术问题上，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中华文化本身就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弘扬我们中华文化并不是提倡国粹主义。善用国际视角，欣赏他者，也是文化自信内心强大、高度确认自己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的体现。另外，我们不必畏惧与西方世界利弊相间的文明冲突和文化碰撞，向先进学习是为了提高自己。我们要以强烈的创造意志，去超越强者，去开拓属于自己的光荣命运。中国历史表明，中华文明具有一种伟大的包容性，事实上，中华文化至今根深叶茂，很大程度上是“多元融合”的结果。例如自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以白马驮经像入华，佛教逐步影响和融入中华固有文化，中国也就此形成了儒、释、道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1922年，伯特兰·罗素曾预言：“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质量中的一些价值，对现代世界极为需要。假若中国人能自由地从我们西方吸收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抵制西方文明中某些坏因素对他们的影响，那么中国人完全能够从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中获得一种有机的发展，并能结出一种把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的优点珠联璧合的灿烂成果！”我们要看到，客观上，不少中华文化经过与西方文化碰撞之后，突破了中西文化原有的文化盲点，变成了新的文化形态；而一些新的文化形态有的已成为世界性共识，正滋养着全人类的进步发展，弥足珍贵。来自文明世界的知识反哺于文明世界的进步，这正是知识传播的崇高意义之一。普罗米修斯的盗火精神之所以永恒不朽，是因为其目的在于造福全人类。记得周有光老先生在他108岁生日时曾写给我一函。他指出：“要从世界看国家，不要从国家看世界。”我想，这位淹通古今、博涉中外的大学者，年过百岁的睿智老人的智慧不但有益于我们这一代，也将有益于我们的下一代。

任何单一的历史性学派，都不能全面概括磅礴富丽的中华文化精神。我们可以从

《山海经》，从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夸父逐日、刑天舞干戚、精卫填海等远古神话里，从《易经》演变到“河图洛书”所显示的图式中，从《尚书》《诗经》《春秋》《楚辞》《史记》不绝如缕、苍茫融合而生的道统里，从孔、老、墨、荀、孟与诸子百家，从《华严经》“六相圆融、事事无碍”之境界，从商周之交到20世纪、21世纪前后一百多年风云际会的激变中，从中华文明固有的仁爱、忠恕、诚信、礼让、宽容、慎独、孝悌、惻隐、悲悯、刚正、嫉恶、从善以及天人合一、尽性知天的博大情怀与高明智慧里以及先哲的经典中，领略不囿于时空睽隔而历久弥新的启示，可以从“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历史回声中，从魏晋六朝建安七子、竹林七贤，最后以陶渊明作结的清新流利的芳华里，从“苏武牧羊”、文天祥的《正气歌》、岳飞的《满江红》那种人格魅力与气贯长虹的浩然正气中，从东晋顾恺之提出的“传神论”“以形守神”“迁想妙得”等绘画论述中，从中国艺术精神的一个最重要的源头《庄子》《逍遥游》《在宥》里，去上溯浩瀚的经史演义和凤骨高蹈、壁立千仞、知所矜式又浪漫华美的文化气韵；也可以在扎根本土文化土壤的基础上，从哥白尼对日心说、哥伦布对新大陆、爱因斯坦对质能转换的论说中，从世界人类史上璀璨如星的文化艺术里，从列宾、苏里科夫、克拉姆斯柯依们敢于告别学院的优渥养尊，以俄国大地为背景，以俄国命运为题材，创作出了如《伏尔加纤夫》这样笔触厚实、意境深远的伟大作品，从弥尔顿之于英国、但丁之于意大利、歌德之于德意志、伏尔泰之于法兰西、托尔斯泰之于俄罗斯、泰戈尔之于印度的巨大文学与文化影响里，从欧洲出类拔萃的多元美学奇峰到二维平面的视觉冲击中，从贝多芬那激昂与超拔优美的英雄性、进取性、战斗性的音乐作品里，去进行诗意的丰饶的心灵体验。万物皆为我所备，只将精识化艺涯。作为一个艺术家，我们难道不需要回顾和学习东西方几千年文明中积淀下来的崇高的、理想的、很有气魄的艺术经典和人类瑰宝吗？

中国正在开创人类新的文明高峰 变革创新是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我曾在多年前就撰写文章强调，我们的时代正处于酝酿新的文明高峰的前期，我们要预先看到那种高处的精神光芒。新时代的中华民族主体文化应是一个充分体现中华民族特性、迈上中国文脉更高台阶的新文化。其既要适合于当下作为一个开放的优秀民族与文化的强国之所需，也应是世界文明与智慧累积至今的一种新的突破与升华。它是为促进人类彼此了解、对话、交流、融通，倡导仁爱、平等、理性而衍生出的一种把世界引向未来的“人文和谐文化”。它必将为构建世界新的文明秩序作出贡献！

20世纪语言哲学的奠基人维特根斯坦有一句名言：“一切伟大的艺术都以人的原始精力作为低音基础。它们不是旋律，但它们是给了旋律以深度和力量的东西。”总而言之，唯有澎湃的创造意志和创新意识才是艺术之河永不枯竭的源泉。爱因斯坦指出：“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汉代桓宽《盐铁论》卷二之枕边第十二篇告诫：“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虽然改革的航程历经千难万险，改革的开拓却从未停歇。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真正的爱国，不仅需要情怀，也需要知识，需要视野。4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更是不断解放思想 and 改革开放相互激荡、观念创新和实践探索相互促进的变革历程。作为约占世界人口总数1/4的最大共同体，中国正再一次站在历史机遇的节点上。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强大的创造意志和创新意识。勇于变革创新，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昭昭

此在，这已成为攸关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性叩问。

说一千道一万，我们的中国，不仅仅是经济物质的中国，还是性灵的中国、道义的中国、人文的中国。作为一个中国画家，我内心深处当然有着强烈的民族心结与寻根的文化心理需求，并一直从优秀传统文化中获得精神资源来滋养自己。同时，面对西方文化，逻辑与理性上我主张我们要做一棵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将枝丫挺直地伸向天空的大树，举目望远，兼容并蓄。其实，严复在100多年前，就用一句很精辟的话概括了中国文化与西方现代性之间结合的必要性。他说“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他又说：“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还有，自我心健身强，借鉴而不模仿，融汇而不芜杂，取舍充拓还得在我。灵府阔拓，且阔且强；地球只有一个，人类本是一家，“协和万邦”“世界大同”“天下一家”本身在哲学意义上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理想与治理智慧，也是将自身命运和前途同世界命运和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代性发展。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现代思维，上接民族传统的慧命与精粹，外连世界的现代通衢，那才是一派层峦叠翠的大好风景！大而无外，小而无内，以心为始，执心为髓，所有智慧的充实都有助于自身头脑的增强和发达。站在公元第三个千年的前阶，中国将以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姿态崛起于世界东方。因此，我们的文化需要融合发展，开放发展。艺术的原点是文化、是历史，更是人类精神文明发展而来的哲学。所以对艺术家与理论家们来说，谈艺术也好，谈哲学也罢，千万不要拘束于自己的小世界，而是要带着人类的文化情怀去思考。真正优秀的艺术创作理念总是屹立在人道主义的大爱理想之巅，总是普济苍生的真理大道！

以漫长的历史观之，没有历代的文化和思想耕耘，就不会有《春秋》《离骚》《汉赋》《国语》《诗经》《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无疑，中华传统文化的粹粹为当代文化艺术的创新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业。几千年来，中华文化之所以历经各种内忧外患而不灭，是因为有一批以天下为己任的优秀知识分子执着地追求正义和传播真理。尽管他们的生命常在苦难中开花，但他们是民族的眼睛，是民族的耳朵，是民族的口舌，是民族的大脑。他们是民族文化精神价值的创造者，是民族的骄傲——这是苍天用雷电刻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神圣使命！

勇于直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敢为中华文化复兴承担历史使命

中国文明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智慧就是忧患意识，而忧患往往又是思想家们的内在品格，因为许多真正的智慧往往产生于忧患。近代先驱梁启超以他特有的强烈的历史直觉，借为晚清重臣李鸿章所作的传记，向苍茫大地、芸芸众生发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警世言论。世事如麻，天道仍在。知乎，所有历史演变的应有之义告示人们，文化史是人类历史之魂，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优秀先进的文化引领，则会危机暗伏。而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取决于文化的复兴和艺术的高度。鲁迅先生曾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光。”一个艺术家之所以伟大，是因其明白中国先哲设下的第一道精神防线是承认良心乃我们道德生涯中的太阳，是因其厚重的作品里有着对生命信息和文化精神的重量携带和正能量的传播，是因其弘扬的艺术精神为人类的文化发展史闪烁了应有的光芒。这也是卓越的艺术家应该秉持的崇高艺术理念。

中国文化的力量，需要借助一个个具体的文化人去体现，历史把庄严的选择摆在很多人面前。每一个伟大时代的里程碑上都雕刻着那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我们不必抱怨历史没有给予像上述历史人物那样的因缘际会，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历史使命！智者的忧愤、道义者的刚健、先驱的孤独其实都是常态。